

## 範式、概念與方法： 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學術歷程與理論反思

黃志繁\*

南昌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前羅香林時代」、「羅香林時代」、「族群理論時代」。研究範式則經歷了從「文化——民系」範式向「族群——認同」範式的轉換，在這一轉換過程中，「族群」概念逐漸取代了「民系」概念。「方言群體」或許是個比較合適指稱客家的概念，但仍應從整體史的角度觀察客家地區的歷史。將來中國大陸的客家研究，應盡力融入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中，並為這些學科提供學術資源才能獲得更大發展；研究方法和領域上應盡量採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拓展客家區域社會經濟史。關於客家源流問題已經耗費客家學者太多精力，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應以「客家形成」代替「客家特質」，致力於更加清晰地展示客家區域社會變遷過程。

關鍵字：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羅香林、族群、區域社會史

---

\* e-mail: huangzhifan72@163.com

投稿日期：2013 年 8 月 30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3 年 10 月 1 日

## **Research Paradigm, Concepts and the Methodology: The Hakka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Zhifan Huang\*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kka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pre-Luo Xianglin era,” “Luo Xianglin era” and “ethnicity theory era.” The Hakka was initially regarded by researchers as a “culture/ ethnic subgroup.” However, many of the recent studies suggested that “the Hakka” is more of a concept of “ethnicity/ ethnic identity,” rather than a “culture/ ethnic subgroup.” Some researchers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the Hakka has formed a “dialect group,”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regional histor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future studies of the Hakka must incorporate the perspectives of three disciplines: histor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t is contended that the researchers should adopt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local socio-economic history. Until recently,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origins of the Hakka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stead of focusing on “w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kkas are,” the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concentrate on “how the Hakkas were/ are being formed.”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Hakka studies, Xianglin Luo, Ethnicity,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

\* Date of Submission: August 30, 2013  
Accepted Date: October 1, 2013

## 一、前言

如果從 20 世紀 30 年代羅香林先生發表《客家研究導論》<sup>1</sup> 開始算起，中國大陸的客家研究被納入學術軌道已經有 70 多年的歷史了。這半個多世紀客家研究之發展不可謂不迅速。不過，客家學研究觀點和流派之駁雜，恐怕也是公認的事實。出現這種局面，當然和客家學這門學問沒有真正建構起來有關。<sup>2</sup> 因此，要推進客家學的進展，在理論上反思目前客家研究顯得非常必要，因為只有在理論上檢討當前研究之成功與不足，才能為未來研究指明方向。事實上，關於客家研究理論的反思，已有多位學者進行了努力，但或僅涉及概念，或從客家學建構角度，或只從某個角度進行，因而仍有較大的反思空間。<sup>3</sup> 本文試圖在學術發展歷程回顧的基礎上，以範式轉換與概念運用為中心，結合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對中國大陸客家研究進行回顧與反思，希望能對推進客家研究盡綿薄之力。

## 二、學術研究歷程

中國大陸的客家研究從很早就開始了，學術界一般把 1808 年執教於惠州豐湖書院的徐旭曾所著《豐湖雜記》作為客家研究的發端。徐旭曾先生提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的見解，並對客家習俗進行了簡單總結。此後，有多人對客家源流、語言、風俗等議題

- 1 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初次發表於 1933 年，其後多次再版，本文引用的是 1975 年臺北古亭書屋版本（見羅香林 1975）。
- 2 王東等學者曾經試圖建立起客家學的理论體系，但由於對「什麼是客家」這類根本問題，客家研究界並沒有達成共識，其建構的學科體系仍有待進一步完善，參考王東（1996）。
- 3 已有一些作者對客家研究進行了理論探討，參考黃向春（1999）、莊英章（2002）、周建新（2003、2005）及王東（2009）。

進行了探討。這一階段的作品包括對後世客家描述影響甚大的晚清黃香鐵所撰《石窟一徵》和溫仲和所編《嘉應州志》。進入民國時代，受西方種族觀點影響，在廣東知識界曾經因為出版物中使用了對客家人污蔑的言辭，引起許多客家籍學者的奮起反擊，也使顧頡剛、洪煨蓮、潘光旦等著名學者開始宣導客家研究（譚元亨、劉小妮 2006：113-116）。

在這一背景下，羅香林開始關注客家研究，1933 年發表了《客家研究導論》（羅香林 1975），並使客家研究確立其學術地位。毫無疑問，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具有開創性的影響，也確立了客家研究的基本範式，即客家祖先為來自於中原的漢人，是中華民族的一支優秀民系，有著優秀的客家文化。羅香林的研究影響了從 1930 到 1990 年代整整半個多世紀，直到現在，「客家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民系」的觀念依然影響著大部分中國大陸主流社會和地方文史工作者。

中國大陸的客家研究學術繁榮局面是從 1980 年代以後開始出現的。1980 年代，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進行，在招商引資和海外客家團體的推動下，客家研究得到了政府、商界和學界的共同推動。在這一形勢下，廣東嘉應師專、龍岩師專等地方高校教師比較早開始了客家研究，但真正把客家研究推進到一個比較高的學術地位的高校還是華東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在吳澤等老一輩史學家的領導下，通過舉辦客家學術會議、創辦客家學術刊物、<sup>4</sup> 舉辦客家學高校教師培訓班等形式，對中國大陸客家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後，廣東的嘉應師專（後更名為嘉應學院）、福建的龍岩師專（後更名為龍岩學院）、江西的贛南師範學院及江西師範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一大批教師也加入客家學術研究潮流中，各高校也相繼成立客家研究學術機構。這一時期的客家

---

4 該刊物命名為《客家學研究》，是以書代刊的刊物，1990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期。

研究，基本上奉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為圭臬，在問題、方法及研究領域上都沒有超越羅香林。

進入 20 世紀末，羅香林的客家研究理論受到了嚴重的挑戰。1994 年，房學嘉出版《客家源流探奧》一書，提出客家人是南遷的中原人與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遺民混化以後產生的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數流落於這一地區的中原人（房學嘉 1994）。謝重光（1995）提出客家是一個文化的概念，不是個血統的概念，由此他亦認為，客家人不可能是純粹來自於中原的正統漢人，而是贛閩粵邊的原住民與北方南遷漢人融合的結果。陳支平（1997）通過大量地比較客家和非客家的譜牒文獻之後，認為客家民系與南方各民系的主要源流來自北方，客家血統與閩、粵、贛等省的其它非客家漢民的血統並無明顯差別，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們都是中華民族一千多年來大融合的結果。通過以上學者的努力，中國大陸學界普遍對羅香林關於客家血統源自中原漢人的觀點表示了質疑，但是，在客家的源流與形成問題上，學者們意見並不一致。

除了對羅香林研究理論的質疑之外，1990 年代以來大陸客家研究有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人類學理論的引入。1980 年代以前，由於中國大陸相對封閉的政治環境，海外人類學家研究客家問題只能到香港、臺灣等地開展研究，這一局面使中國大陸客家研究比較晚近才和海外人類學家合作。1990 年代以來，孔邁隆（Myron L. Cohen）、謝劍（Xie Jian）、勞格文（John Lagerwey）等海外人類學家紛紛進入中國大陸客家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並與當地學者開展合作。海外人類學家的到來，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大陸客家學術研究的局面，特別是勞格文教授。他主持的大型研究計畫「客家傳統社會結構與原動力」的合作者幾乎囊括了中國大陸贛閩粵三省所有研究客家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者，及大量地

方文史工作者，並在每個客家地區推出了一本以上田野調查報告集（勞格文 1996-2008）。進入 21 世紀，在海外人類學家的影響下，中國大陸客家研究者研究的問題意識開始擺脫單純的探討客家源流問題，研究領域也由族源、民俗拓展至宗族、民間信仰、廟會與墟市經濟等，研究概念也開始頻繁使用「族群」、「社區」等社會人類學概念，而「民系」這個詞彙的使用則越來越少。略有遺憾的是，在運用族群理論研究客家方面，中國大陸客家學術界還缺少類似澳大利亞華裔學者梁肇庭（Leong 1997）那樣的傑出研究。他運用族群理論和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區域經濟體系理論，成功地展現了在明清華南地區作為一個「族群」的客家人的形成過程。

2006 年，陳春聲發表〈地域認同與族群分類：1640-1940 年韓江流域民眾「客家觀念」的演變〉一文，對 1640 至 1940 年韓江流域民眾「客家觀念」的演變過程進行研究。他認為，客家人作為一個族群的觀念，經過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才浮現：由明末清初的「遷海」與「復界」所帶來的「語音不類」的族類認同，到後來清代中期客人通過族譜修撰對祖先來源「歷史記憶」的塑造，再到近代族群分類意識的傳入、近代教育的推廣和近代城市興起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改變，最後到羅香林等知識份子將「客家人」定義「標準化」（陳春聲 2006）。陳春聲的研究將族群理論和「想像的共同體」等社會學理論運用於區域社會觀念變遷中，比較好地展現了「客家認同」意識在一個區域內的形成過程，應當是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學者運用人類學理論研究客家比較優秀的成果。此外，一些年輕的人類學者、歷史學者、社會學者也開始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比較新的概念，嘗試著對客家社會提出了一些新的認識。正如勞格文在為周建新的專著所寫的序中所說：「他專注於調查眼下中國及其他地方最緊迫的社會與文化問題，緊跟國際學術潮流，開始創造

性地使用當代西方人類學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新概念，如象徵資本、文化資源、文化抗爭、文化經營、文化聯繫等」（周建新 2006：2）。

總結起來，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發展歷程與研究範式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徵。第一階段，可稱之為「前羅香林時代」，即從 1808 年徐旭曾發表《豐湖雜記》至羅香林 1933 年發表《客家研究導論》，這一階段研究者大多結合自身的觀感，從進化論角度對客家問題進行研究。第二階段可稱之為「羅香林時代」，即從 1933 年羅香林發表《客家研究導論》開始至 20 世紀末，這一階段雖然有族群理論的引入，但中國大陸客家研究者大多依然採用羅香林開創的「民系——文化」範式展開研究，即使反對羅香林觀點的研究者亦不例外。第三階段可稱之為「族群理論時代」，即從 21 世紀開始至今，中國大陸客家研究者開始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理論，特別是族群理論來研究客家問題，湧現了一批比較新穎的成果。<sup>5</sup>

1980 年代以來的客家研究發展，形成了若干個中國大陸客家研究重鎮。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華東師範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該中心有客家研究的先導之功。另兩個重要陣地是廣東梅州的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及江西贛州的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院。他們都分別是省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已出版了數量比較多的客家研究論著，<sup>6</sup> 連續召開了多次學術研討會，分別編纂客家學術專門刊物《客家研究輯刊》和《客家學刊》，促進了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繁榮局面。此外，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龍岩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等院校也是中國大陸重要的學

5 王東（2009）反對在客家研究中使用「族群」概念，其中主張請參考下文的相關討論。

6 列舉學術論文過於繁雜，僅列若干學術專著以供參考，如宋德劍（2008）；宋德劍等（2002）；蕭文評（2008）；周建新等（2007）；周雪香（2007a、2007b）；房學嘉（2002、2008a、2008b）；林曉平（2006）；張嗣介（2006）；陳世松（2005）；萬幼楠（2006）；劉大可（2002、2008）；謝重光（2002）；羅勇（2004、2006）；鐘俊昆（2004、2006、2009）。

術機構。<sup>7</sup>同時，中山大學的一些人類學者、社會學者也撰寫了一定數量的學術論著。<sup>8</sup>

### 三、範式轉換與概念

近年來，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經歷了一個比較明顯的範式轉換歷程，即從羅香林的「民系—文化」範式轉變到「族群——認同」範式。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中發明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民系。關於民系，羅香林先生（1975：25）是這樣解釋的：「『民系』一詞，是我個人新造出來用以解釋民族裡頭種種支派的」。所謂民系，就是民族下面的分支，而客家就是漢民族下的一支民系。作為受過嚴格現代學術訓練的羅香林之所以發明民系一詞，是為了證明客家是漢民族中一個優秀民系的觀點。他的三段論式理論闡述為：民族內部分化出民系是很自然的現象，而民系與民族優秀與否，並不取決於成形時間的早晚和血統是否純粹，而是取決於文教的高低和曆階（歷經磨難）的多少；客家是漢民族中的一個支派，雖然成形較晚，血統也不純粹，但是，文教比較發達，從而能同化畚民，且歷經磨難（所謂曆階），演變成一支優秀的民系。在此理論表述的基礎上，在《客家研究導論》中，羅香林分別從語言、文教、客家特性及其與近代中國的關係等方面論證客家文化的先進性。《客家研究導論》中的理論表述，確立了客家研究中一個經典的範式，即「民系——文化」範式（黃志繁 2007：90-96）。

雖然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先後有多位學者發表專著，對羅香林的觀點進行挑戰，他們一方面以各種方式反對羅香林所謂的「客家的

7 這些機構出版許多著作，例如周雪香（2006、2007）；謝重光（2002）；劉大可（2002、2008）；陳世松（2005）。

8 例如黃淑婷（1999）及何國強（2002）。



主體是中原南遷漢人」的觀點，另一方面則主張客家是南遷漢人與南方土著民族「融合」的結果。但是，如前所述，羅香林在其《客家研究導論》中並沒有否定客家是南遷漢人與南方土著融合的事實。實際上，歸結出「客家祖先是中原南遷漢人，因而擁有優秀的文化」的觀點，並不是羅香林的學術表達，更多的是客家族群自身的認識。

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雖然大多數挑戰羅香林觀點的學者對羅香林的研究方法有超越之處，例如房學嘉（1994）運用了大量田野調查資料補充文獻資料之不足，陳支平（1997）把非客家人族譜與客家人族譜進行比照，但是，他們對羅香林的質疑卻採取了和羅香林同樣的方法，即從族源上來認定客家。不僅如此，當學者們質疑羅香林過分強調中原血統的時候，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羅香林對客家的認定並不完全依據血統，而是更強調文化。實際上，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除了強調客家中原血統之外，也注意到了客家與畬民之間的血緣融合，從而發明和解釋了「民系」理論，並從文化上來論證客家民系之優秀；同時，他對客家的界定，依據了客家人士的訪談，暗合了現代族群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曹樹基（1997）批評從移民遷入時間的早晚和方言來區分客家與非客家是在羅香林認識基礎上的倒退。也就是說，雖然當前客家研究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但是，在理論上，卻並沒有超越羅香林。易言之，他們的研究依然可歸入羅香林開創的「民系——文化」範式，即認為客家為漢民族的一個分支，其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質，例如與其他周邊民系相比，或是「先進」的，或是與眾不同的。<sup>9</sup>

毫無疑問，把客家當作一個族群（ethnic group），而不是一個民系或民族，有助於客家研究的推動。在當代人類學理論中，族群的界定逐漸由語言、血緣、風俗、體質等客觀因素的強調，轉向對族群邊界的強

9 黃向春（1999）指出了客家界定中的兩種理論方法與框架，即「民系——文化」論與「族群——認同」論。本文認為，由於羅香林研究的典範性影響，「民系——文化」已經成了客家學研究中許多學者共同認可的範式。

調，即對族群認同意識的重視。「族群」與「民系」相比，更為強調與其他群體的互動，其中核心是「族群邊界」的產生，即「本族意識」和「異族意識」的產生。「客家」這個稱謂正是在與土著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因而族群理論非常契合客家研究之需要。更重要的是，族群之界定所強調的是「族群認同」意識之產生，這一點正好可以超越長期以來客家研究所體現出來的「客觀特徵論」，即認為客家具有一種特質，其特質體現在包括語言、血緣、風俗、體質等客觀存在的方面。從族群理論視角看來，客家之所以是客家，關鍵並不在於語言和血緣與其他人群不同，更重要的是族群意識不同，即「客家人」意識到自己是「客家人」，且會有意識地製造出與別的族群不同的諸如語言、風俗等「客觀」界限。因此，客觀存在的一些人群特徵儘管仍很重要，但都變成了次要，最關鍵的還是「族群邊界」的形成。

族群理論之所以對客家研究有幫助，還在於當今客家人正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認同的族群之事實。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因素，加上網際網路普及等原因，目前地方政府、知識份子、民間社團等群體正在建構一個全球性的「客家人」認同意識。從世客會的舉辦到網路論壇的熱鬧，從中國大陸的招商引資到臺灣的族群政治，「客家人」正變成一種話語（discourse），一種可以建構的身份。在這個背景下，如果再用「民系—文化」這一範式來研究客家問題，根本無法把握到當今客家認同背後的動機，即客家人之所以願意構建為具有共同的祖先和優秀基因的全球性的族群，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客觀上具有這些共同因素，而是不同的（客家）人群都「願意」並「希望」他們具有這些共同的因素。

毫無疑問，族群理論是個比較靈活的概念，而正是由於其靈活，使其能夠有效地幫助學者處理複雜的客家源流問題，從而大受現代客家學者歡迎。可以說，目前「族群」已經取代了民系成為客家研究中最有分

析力的概念。但是，正是由於「族群」的靈活性，研究者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容易忽視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必須有「族群邊界」才能產生族群，一個社會群體必須有自我認同並且與其他周邊群體進行了「自我」與「他者」的劃分才能稱之為「族群」。實際上，「客家」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著「他群」，即既然是「客家」，必然有「土著」。問題在於，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客家」概念，在歷史上並不當然就有，特別是明清以前的歷史文獻中，我們完全看不到「客家」一詞，<sup>10</sup>最多的是「客籍」之類的字眼，更遑論具有他我邊界的「客家族群」了。

王東是比較鮮明地反對使用「族群」概念的中國大陸客家學者。他認為，用「族群」概念來代表「客家」是有條件的。他引用梁肇庭的研究作為證據，認為：「只有從十六到十七世紀開始從贛閩粵邊不斷遷至嶺南的那部分人，才能稱之為『客家族群』。問題在於：其一，並非所有居住在贛閩粵邊的居民，都在這一時期向外遷移，如果用『族群』來界定他們之中的移居者，那麼，對於一直留居在贛閩粵邊的居民（他們才是主體），又該如何界定？其二，既然『客家族群』產生於十六到十七世紀的贛閩粵邊居民的大規模外遷，那麼對於此前生活在贛閩粵邊的居民，又該如何界定」（王東 2009：134）？他進而認為，「族群」這個概念，揭示的只是客家這個地域性語言文化群體的次生形態，它所涵蓋的客家歷史與文化資訊，在時空範圍上都是十分逼仄的。基於此，王東強調了以方言界定客家的重要性，他以「方言群體」取代「族群」，對客家的源流提出了新說。他通過史料的爬梳和整理，認為元代中後期，隨著贛南、閩西人口向粵東北的遷移，梅州和循州一帶的語言與贛南、閩西趨近，贛南、閩西和粵東北三個原本獨立的地理空間，逐漸變

10 關於「客家」概念的辨析，請參考饒偉新（2005）。據學者考證，明末清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是最早出現「客家」一詞的文獻，而根據筆者對贛南文獻的瞭解，贛南文獻中最早出現「客家」的是康熙年間編纂的興國縣誌《潞水志林》。

成了一個新的語言文化群體，即方言意義上的客家。明清時期，這個新的語言文化群體又開始向四周擴散，形成「離心式的移民」，從而與當地文化結合，裂變成各種「亞語言文化群體」，即形成今天我們所見的各地不同的客家文化風貌。

王東抓住方言這一可以感知的客家文化的特徵，獨闢蹊徑地提出以「方言群體」取代「族群」來指稱各種「客家」群體，顯得非常有見地，是對客家研究的極大推動。基本上讓長期爭論不休的客家源流問題有了比較合適的答案。不過，由於我們無法考察歷史上人們使用的方言，因此，僅通過描述性的資料確定「元代中後期」形成客家方言群體，實際上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意識到「方言群體」概念的這一缺陷，我們就應擴大視野，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整個客家區域的歷史變遷中去。也就是說，我們不應侷限於從語言、風俗之類的角度入手去瞭解客家的歷史，而應從整體史的角度去觀察客家地區的歷史。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瞭解客家的歷史和文化，所謂的「客家源流」問題也才能有更好地答案。

#### 四、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如果我們以比較嚴格的標準來看中國大陸客家學術的發展。可以說，自羅香林以來，70 多年的中國大陸客家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還是存在學科定位不清晰、整體水準不高、研究領域急需拓展、受現實利益影響過大等問題，具體表現為如下三個問題。

##### （一）客家學的學科定位問題

客家學已經由許多學者提出並部分得到了學界的肯定，但是「客家學」並沒有正式獲得承認，沒有在中國大陸教育部制定的學科體系中獲

得單獨的名稱。它不是一級學科如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下的二級學科名稱，通常被放入文化人類學、專門史、民俗學等二級學科下，成為某個研究方向。客家研究的專門機構大多設立在地方高校中，而中國大陸的重點高校中，<sup>11</sup> 也比較少設立專門的客家學研究機構。

出現這種局面，原因有三：第一，雖然客家學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對「客從何來」、「什麼是客家」一類基本問題，學界並無共識，這顯然對客家學獲得自身的學術地位極其不利；第二，學科歸屬不明顯，目前中國大陸從事客家研究的有歷史學者、社會學者、人類學者及民俗學者等等，客家學應歸屬哪一學科目前沒有定論；第三，可能是最根本的一點，即客家學沒有在資料和問題上對主流學科，例如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做出貢獻。綜觀學術發展史，一個學科要成為被學界認可的單獨學科，必須對主流學科做出資料上的貢獻或者是解決了某些問題。例如，敦煌學為佛教學術史和中國古代史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和問題，徽學也在資料上為史學界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寶庫。

和徽學等學科不同的是，客家學的興起並不是因為資料上的突破，而更多的是一種現實需要的刺激，因而我們不能奢望客家學在資料方面獲得突破。另一方面，客家學也需要跨學科的交融才能有較好地發展，因此，我們應將客家學當作一個開放的學科平台，而不是專屬某學科的學問。事實上，歸屬於哪一學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通過跨學科的組合和融合，做出能夠回答主流學科核心問題的優秀的學術成果。

在這方面，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應做出更大的努力。目前中國大陸客家研究學者中，以歷史學和民俗學背景居多，而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則較少長期關注客家議題。相應地，在中國大陸客家研究成果中，我們

<sup>11</sup> 此處所指「重點高校」，即一般屬於所謂 211、985 的大學。

也比較少看到對現實的客家認同問題、文化產業問題、客家社區問題的研究。<sup>12</sup> 但是，客家作為一個族群現象，已經被編織進複雜的歷史和現實進程中，「客家族群」歷史和現實的複雜面相，應該是人類學者比較感興趣的問題，也應該能夠在這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理論見解。另一方面，目前中國大陸客家研究和學術活動，已經裹挾著太多經濟利益、政治考量和地方榮譽於其中，「客家文化」和「客家認同」已經成為比較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社會學者應關注這一現象，並提出新的社會理論來解釋。惟有將客家的研究變成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並為學科發展提供具有魅力的學術資源，客家學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和更高的學術地位。

## （二）客家研究中領域拓展和方法論問題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客家研究學術界大多圍繞著客家源流問題爭論不休，並一度形成繁榮的學術局面。為了釐清客家源流問題，學者們或汲汲於各姓族譜中尋找歷史痕跡，或窮經皓首於文獻史籍中，或參考採納田野考古資料，雖然方法不一，但研究領域相對集中在歷史上的客家地區移民遷徙、民俗風情、姓氏源流等方面。20 世紀末期，受人類學影響，研究領域拓展至宗族、廟會、市鎮經濟、神明信仰等諸多方面，但耐人尋味的是，客家族群認定中至關重要的「族群認同」相關議題卻少有學者討論。研究領域拓展背後其實是研究方法的更新。「族群認同」議題少有人討論這一事實表明，雖然中國大陸客家學者已經廣泛使用「族群」概念，但是，真正在研究中貫徹運用族群理論的並不多。類似梁肇庭（Sow-Theng Leong）專著那樣把「客家」族群意識形成過

12 中國大陸學界有一些關於客家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的論文，但水準並不高。另，周建新曾經分析過世客會的文化意義，見 Zhou (2007)。

程描述得比較清晰的著作幾乎沒有出現。梁肇庭描述的實際上是一個歷史過程，一個客家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故事，一個關於客家族群的故事，就象很多古老的傳說一樣，告訴人們許多事情的來龍去脈，人們通過這個故事，也自然地獲得了關於「客從何來」、「何為客」等問題的解答。應該說，作為歷史學家的梁先生，比較擅長的正是通過對各種史料的解讀，給我們講述事情的來龍去脈，人類學的理論在這裡只是一種幫助閱讀和整理史料的工具，這種方法應該稱之為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因此，在運用族群理論研究客家形成問題的時候，歷史學的方法也許才是根本，族群理論只是一種幫助思維的工具。

目前，關於贛南、閩西、粵東北已經有了比較精深的區域社會史研究著作，儘管這些研究的出發點並不是客家，但透過這些花費作者多年心血的著作，我們不難發現，通過作者對區域社會史脈絡的梳理，一些困擾學界多年的問題都能得到相對滿意的回答（e.g., 饒偉新 2002；黃志繁 2006；蕭文評 2011；Liu 2003）。以蕭文評（2011）對白堀鄉的研究為例，他通過大量的歷史文獻的解讀，展現出一個明代中葉具有畚、瑤背景的「盜窟」轉變為清中期「聚族而居」的「鄒魯之鄉」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所謂的「畚」、「瑤」族群是如何「漢化」為「漢」人的過程，明瞭了這一過程，也就不難理解客家人和歷史上的畚、瑤之間的密切關係了。更重要的是，在對明清時期粵東北區域社會變遷脈絡有了相對清晰瞭解的基礎之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羅香林等先輩學者在「建構」其客家學之際，面對的是怎樣的社會文化氛圍，而這一點，恰恰是為以往幾乎所有客家學者所忽視的。在贛閩粵邊界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明中期以來贛閩粵邊界社會經歷的從「盜窟」到「鄒魯之鄉」的過程，使贛閩粵邊界的人們開始強調自己的「正統」身份，在這個背景下，祖先來自於「中原正統漢

人」的觀念很容易被建構出來，並體現在族譜中。正是這一事實，構成晚清時期「客家人」自我書寫族群歷史的基礎。也就是說，羅香林等人面對的社會氛圍、族譜資料和歷史記憶都使他很容易得出「客家人是來自於中原南遷的漢人」的結論（黃志繁、周偉華 2009）。<sup>13</sup>顯然，如果沒有對區域社會的深入研究，我們很難「同情地理解」羅香林先生的開創性研究。

在劉正剛（1997）、陳世松（2005）精彩的客家移民史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贛閩粵邊界地區、兩湖地區、四川地區的客家人其實是輾轉聯繫在一起的，但是，四川、兩湖地區卻比較少帶有客家問題意識的深入區域史專著。同樣，廣西博白和陸川地區、湖南南部關於客家的區域社會經濟史專論也比較不夠。筆者以為，只有以歷史人類學的視野，加強客家地區區域社會史研究，才能在厚重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基礎上，真正地瞭解「客家」社會。這在中國大陸，尤為關切。因為通過學者的不懈努力，臺灣客家的社會經濟史已經相對清晰，而中國大陸客家地區幅員遼闊，歷史複雜，我們如果沒有深刻認識其社會變遷，如何奢談「客家文化」？

### （三）客家源流問題

關於客家源流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大陸學界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在反對或者修正羅香林的觀點，但又幾乎沒有哪位學者的觀點能比羅香林的觀點更深入人心。應該說，關於客家源流問題，是中國大陸客家學界一度最為興奮的話題，也是一個成果比較集中的領域。就客家民系形成的時間而言，形成了魏晉南北朝說、唐代說、南宋說、明清說等多種說法；就客家民系構成而言，形成了南方土著

13 前引陳春聲（2006）一文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過程。



民族主體說、畚漢雜流說、中原漢人主體說、文化群體說等等。<sup>14</sup> 經過一番爭論，羅香林的觀點普遍遭到質疑。可以說，雖然羅香林的觀點仍普遍為政府和民眾所接受，但學術界基本已經不再堅持羅氏觀點，所謂「客家人來自中原正統漢人」的論調已經不被大多數學者接受。

正當學者們以為已經超越了羅香林學術觀點的時候，來自遺傳學界的兩份研究報告卻非常有力地支持了羅香林的觀點。首先，來自復旦大學生物學家李輝和語言學家潘悟雲等人（2003：873-880）通過對福建長汀的 148 個客家男子做了遺傳分析。從父系遺傳的 Y 染色體 SNP 的主成分分析，認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應是中原漢人，畚族是對客家人影響最大的外來因素，客家話等南方漢語方言最初也可能是南方原住民語言在中原漢語不斷影響下逐漸形成的。其次，最近的一份關於客家人基因分析的報告，也幾乎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來自美國的匯澤基因公司，啟動了「客家人基因族譜」項目，他們檢測了福建寧化境內的 105 個姓氏的 393 個樣品，其中一些姓氏有不同的血緣分支，所以總共獲得 279 個姓氏家族的樣本，於 2011 年公佈了兩個結論：在這些姓氏家族中，絕大部分（將近三分之二）的父系血緣來自北方中原漢族，小部分來自百越族群和苗、瑤族群（畚族），寧化是客家祖地，而寧化的客家姓氏與其他客家地區的客家姓氏分佈也很類似。因此，客家基因族譜的系統分析表明了客家人起源的主體是北方中原漢人；遺傳學支持石壁的獨特歷史地位，石壁的姓氏的父系血緣中，中原漢人起源的比例（75%）遠遠高於寧化的其他區域（65%），尤其高於寧化北片的水茜、安遠、泉上一帶（59%），在這麼狹小的地理區域裡，能形成這麼大的血緣成分的差異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中原漢人在南遷時，一下子湧入了寧化石壁

14 除了前引學者之外，另有大量學者投身於此，今列若干論著如下，如劉佐泉（1991）；蔣炳釗（1993）；羅勇（1994、2004）；吳松弟（1995）；周振鶴（1996）。

這個狹小區域，形成了絕對的優勢。<sup>15</sup>

面對生物科學的挑戰，中國大陸客家學者尚未正式回應。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生物學家們用自然科學手段來研究客家源流問題，看似科學，但依然必須借助客家學界已有的成果，例如，他們對客家人姓氏和族譜的認定，對何謂「北方中原漢族」的認定等。實際上，關於客家源流問題已經耗費客家學者太多精力，目前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應是，將客家形成過程放置於一個具體的歷史場景中分析和考察，更加清晰地展示客家地區及客家人變遷的過程。正如臺灣學者羅烈師（1999：117-137）所言，客家學的關鍵問題不是客家特質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哪些力量在界定客家」。也就是說，關鍵不在於「是什麼」（what），而是如何（how）。因此，客家研究主題應以「客家形成」（hakkalization）取代「客家特質」（hakkaness）。顯然，這一呼籲和前面筆者強調的客家研究應拓展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觀點遙相呼應。

本文的寫作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 AOE 專案「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資助，謹此致謝。

15 筆者對該觀點的獲得主要來自於 2011 年在成都舉辦的「第三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及網路資訊（見 zjmkj 2011）。2011 年，《從客家人基因族譜研究看中華民族融合的歷史》，百度貼吧，<http://tieba.baidu.com/p/1330151902>，取用日期：2013 年 8 月 28 日。

## 參考文獻

- 王東，1996，《客家學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_\_\_\_\_，2009，〈客家研究：範式的轉移及其思考〉。《客家學刊》1: 12-135。
- 何國強，2002，《圍屋裡的宗族社會：廣東客家族群生計模式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 吳松弟，1995，〈客家南宋源流說〉。《復旦學報》55: 108-113。
- 宋德劍編，2008，《地域族群與客家文化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宋德劍等，2002，《民間文化與鄉土社會：粵東豐順縣族群關係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
- 李輝等，2003，〈客家人起源的遺傳學分析〉。《遺傳學報》9: 873-880。
- 周大鳴，2002，《中國的族群與族群關係》。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 周建新，2003，〈客家研究的文化人類學思考〉。《江西師範大學學報》4: 113-117。
- \_\_\_\_\_，2005，〈族群認同、文化自覺與客家研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 75-79。
- \_\_\_\_\_，2006，《動盪的圍龍屋：一個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與文化抗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建新等，2007，《江西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周振鶴，1996，〈客家源流異說〉。《學術月刊》33: 16-24。
- 周雪香，2007a，《明清閩粵邊客家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_\_\_\_\_ 編，2007b，《多學科視野中的客家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房學嘉，1994，《客家源流探奧》。廣州：廣東高教出版社。
- \_\_\_\_\_，2002，《圍不住的圍龍屋——粵東古鎮鬆口的社會變遷》。廣州：花城出版。
- \_\_\_\_\_ 編，2008a，《粵東客家生態與民俗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_\_\_\_\_ 編，2008b，《廖安祥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林曉平，2006，《客家祠堂與文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張嗣介，2006，《贛南客家藝術》。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曹樹基，1997，〈贛、閩、粵三省毗鄰地區的社會變動和客家形成〉。《歷史地理》14: 1-15。
- 莊英章，2002，〈試論客家學的建構：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廣西民族學院學報》4: 40-43。
- 陳支平，1997，《客家源流新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 陳世松，2005，《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陳春聲，2006，〈地域認同與族群分類：1640-1940年韓江流域民眾「客家觀念」的演變〉。《客家研究》1: 1-43。
- 勞格文（John Lagerwey），1996-2008，《客家傳統社會叢書》（1-36卷）。香港：國際客家學會、法國遠東學院。
- 黃向春，1999，〈客家界定中的概念操控：民系、族群、文化、認同〉。《廣西民族研究》3: 21-23。
- 黃志繁，2006，《「賊」、「民」之間：12-18世紀地域社會》。北京：三聯書店。

- \_\_\_\_\_，2007，〈什麼是客家〉。《清華大學學報》4: 90-96。
- 黃志繁、周偉華，2009，〈生態變遷、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晚清“客家”族群認同建構的歷史背景〉。《客家學刊》1: 66-93。
- 黃淑娉，1999，《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萬幼楠，2006，《贛南圍屋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劉大可，2002，《閩西西北的村落文化》。香港：國際客家學會、法國遠東學院。
- \_\_\_\_\_，2008，《閩臺地域人群與民間信仰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
- 劉正剛，1997，《閩粵客家人在四川》。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 劉佐泉，1991，《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蔣炳釗，1993，〈關於客家形成問題的思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66: 57-62。
- 蕭文評編，2008，《羅香林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_\_\_\_\_，2011，《白堊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北京：三聯書店。
- 謝重光，1995，《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_\_\_\_\_，2002，《畚族與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羅勇，1994，〈略論明末清初閩粵客家的倒遷入贛〉。頁 59-64，收錄於謝劍、鄭赤琰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
- \_\_\_\_\_，2004，《客家贛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_\_\_\_\_編，2006，《客家文化特質與客家精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羅香林，1975，《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古亭書屋
- 羅烈師，1999，〈臺灣地區客家博碩士論文述評（1996-1998）〉。《客

- 家文化研究通訊》2: 117-137。
- 譚元亨、劉小妮，2006，〈近現代客家學術史〉。《學術研究》7: 113-116。
- 鐘俊昆，2004，〈客家文化與文學〉。海口：南方出版社。
- \_\_\_\_\_，2006，〈客家文學史綱〉。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_\_\_\_\_，2009，〈客家山歌文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饒偉新，2002，〈生態、族群與階級：贛南土地革命的歷史背景分析〉。廈門市：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 \_\_\_\_\_，2005，〈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客家」稱謂由來考論：以清代以來贛南的「客佃」、「客籍」與「客家」為例〉。《民族研究》6: 92-100。
- Liu, Yonghua (劉永華), 2003, *The World of Rituals: Masters of Ceremonies (lisheng), Ancestral Cults, Community Compacts, and Local Temples in Late Imperial Sibao, Fujian (Chin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 Leong, Sow-Theng (梁肇庭), 1997,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ou, Jianxin (周建新), 2007, "Hakka Ethnic Group Ident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n Anthropologic Analysis about the World Hakka Conference."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0: 83-99.
- Zjmkj, 2011, 〈從客家人基因族譜研究看中華民族融合的歷史〉。百度貼吧，2月16日。<http://tieba.baidu.com/p/1330151902>，取用日期：2013年8月28日。